

【标题】= 美式外交——意识形态作怪


【作者】= 赵可金

【日期】= 2010.02.01

【版次】= 23

【版名】= 国际

【专栏】=

【正文】=  原版浏览说明

美式外交——意识形态作怪

赵可金 (2010.02.01)

美式外交——
意识形态作怪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可金

近一个月来的中美关系，树欲静而风不止。先是华盛顿宣布推动对台军售，随后“谷歌事件”引发中美舆论热议，美国务卿等政要纷纷高调出场，批评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谋求推动什么“互联网自由”，奥巴马总统还放话要会见达赖以支持所谓“中国的人权”，甚至于一些美国媒体还煞有介事地把早在三年前就策划筹拍的热播电影《孔子》炒作为“中国压制《阿凡达》的政治战略”。一时间，去年奥巴马访华和《中美联合声明》发表所形成的中美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发展的势头一下子被笼罩上阴影。

事实上，和美国打过交道的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曾指出过美国外交中存在着类似于“歇斯底里”式的反复无常倾向。这个国家并不认同“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甚至有时候国会、总统和法院在某一对外议题上的态度都不完全一致。毫不令人奇怪的是，连一些极端保守的国会议员都认为总统会见达赖的行为愚不可及。被总统认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伊拉克战争被美国民众嗤之以鼻。对一些与美国交往的国家，总会感受到美国外交中存在着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势，这些思维定势也总是不时地在国家交往中发作，演化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事件。

许多研究美国外交的学者将美国的此种思维定势称之为美国意识形态。尽管多数普通的美国人并不喜欢“意识形态”这个词，但美国的确有一种可称作“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瑞典历史学家冈纳尔·米尔达尔在20世纪初就认为，追求自由民主的“美国信念”，推动着美国在美洲和全球作出持续不懈的努力。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H·奇尔科特也认为美国“到处充满了意识形态，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内，认为美国好，认为美国必须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人民中显示它的文明传统”。因此，正如迈克尔·亨特所说，意识形态是美国外交的“过滤器”，“忽略了意识形态，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遗漏了关键性的一步”。

透过纷乱的美国外交万象，人们经常碰到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观念。最典型的一种是“天定命运观”。此种观念的核心是，认为上天决定了整个世界有待于美国的救赎。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此种观念绝非是像美国人口头上所说的那样“替天行道”，也并没有给美洲和世界带来所谓福音和繁荣，它本质上不过是凭借超强的国力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此种“天定命运”的半神学观念掩盖了美国谋求霸权的真实意图，特别是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仿佛整个世界未来的命运就是等待着美国的占领，并吹嘘为这是“神的旨意”。

与“天定命运观”紧密联系的是“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与众不同。最初，此种观念开始还只是一种白人对肤色偏爱的种族等级观念，后来逐渐形成了歧视有色人种的社会偏见，沉淀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应该共同领导世界“传递福音”。

美国人还有一种道德上自己奉若圭臬的“利他主义”信念，在美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美国代表着“白天的光亮”，在其他地方如非洲、拉美、亚洲有一个“黑暗的传说”，是一些“道德的荒原”或者“半文明的帝国”，认为美国的外交并不像其他一般国家那样只为一己私利，而往往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甚至包括它的对手。

从一战、二战、冷战一直持续到冷战后，美国都把自己美化为全球的道德家。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以“领导现代世界政治文明为天职”，从威尔逊的和平计划，到杜鲁门的保卫民主，一直到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的“3D”外交：民主外交、全球发展和共同防御，都显示出其“天定命运观”。然而，美国的这些意识形态在越南战争中栽了跟头，在伊拉克战场陷入危机，在21世纪遭遇恐怖主义集中袭击。美国人高估了自己的所谓“普世价值”，更低估了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捍卫民族价值和权利的坚强意志。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可能会成为美国政治家论证外交政策正当性的道义凭据，至于其在具体对外政策制定上的考虑是什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许正如现实主义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大失败与大混乱》中所说过的那样：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类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类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类则需自身清白。除非美国能够放弃自己意识形态深处的那种不平等的“天定命运观”、“好为人师观”和“美国例外论”，真正通过加深国际之间的交流，用历史的事实法则在思想意识深处“除魅”，用充满平等的眼光了解其他民族的真实面貌和思想信念体系，用事实的公正反对思想意识中的狭隘，否则，美国将免不了约瑟夫·奈所警告的那样，美国无法摆脱“强权的悖论”。